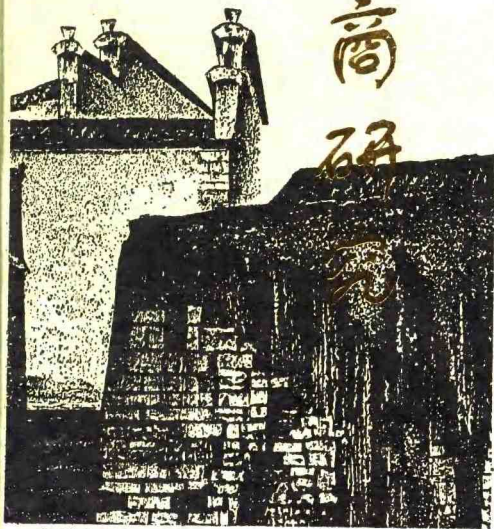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

主编/张海鹏 王延元

徽商研究



安徽人民出版社

99
F729.48

11
2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

徽商研究

558510

主 编 / 张海鹏 王廷元

副主编 / 孙树霖

安徽人民出版社



C

558858

责任编辑 曹文益
秦 闯
周哲波
装帧设计 蒋万景

徽 商 研 究

主 编 张海鹏 王廷元 副主编 孙树霖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1 字数:546 千

版次: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212-01266-1/F·230

定 价:28.00 元

印数:00001—02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近年来,徽商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下,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的内容不断深入,研究的方法不断更新,不同观点的交锋也日趋活跃,引人注目。徽商研究热潮的兴起不是偶然的。自明朝中叶至清末、民初的数百年间,徽商一直是活跃于全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商的活动对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不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徽商活动的方式及其势力的消长又无不受到当时社会条件多方面的制约,因而透过徽商兴衰演变之迹可以从一个侧面窥探当时整个社会的全貌。因此,无论是研究明清史的学者还是研究徽州学的学者都不能不关心徽商的研究。尤其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学术界过去那种重视研究生产而较少研究交换的倾向,已与现实的需要不相适应。为了更好地认识国情,寻求历史的借鉴,人们对我国商业发展的历史自然特别注意。在这种形势下,徽商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我们相信,在改革不断深入的大好形势下,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徽商研究的热潮必将更加高涨。

我们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几位同好,深感徽商研究的重要,于80年代初即成立了明清史研究室(现改称徽商研究中心),发挥集体的力量开展徽商研究工作。我们研究的这个课题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的项目,国家教委和省教委等主管部门也给予大力支持,所以进行得较为顺利。我们的研究工作首先是从搜

集资料做起的。经过数年的努力,从搜集的100余万字的资料中筛选出40万字,汇集成《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一书,于1985年由黄山书社出版。此后,我们便在继续搜集资料的同时进行一些专题研究。在这几年中,研究中心的同志们所撰写的这方面论文已发表的就有30余篇。此外,我们还把一部分研究成果缩写成《徽州商帮》,作为《中国十大商帮》的一部分,于1993年由黄山书社出版(香港中华书局和台湾万象图书有限公司分别于1995年初再版)。这部《徽商研究》便是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

明清时期的徽商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在这部《徽商研究》里,我们不是对徽商的历史及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加以全面论述,而只是就下述几个主要问题作些研究和探索,藉以提出我们的看法,并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所论述的问题作出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在方法上,我们力求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做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综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并从实际需要出发,尝试着应用计量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及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在应用这些方法时,抱定一个宗旨:不求标新立异,但求有助于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

当然,我们在一些问题的探讨中,所得出的结论,所采取的方法,不一定是恰当的或者说是合乎科学的。但是,诸如徽州商帮形成于何时?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徽商资本是如何积累的?徽州商帮的主要特色是什么?如何看待徽州人的“儒贾观”?如何区别徽州盐商从事生产、城建、文化方面的积极活动与奢侈性消费?如何看待徽州商业资本与封建地权的关系?怎样认识徽商是徽州文化的“酵母”?如何看待徽商衰落与咸同兵燹的关系?如何分阶段地具体分析徽商的衰落?等等,却是一串串很有价值和意义的课题。我们的看法如能成为引玉之砖,也是值得高兴的。

另外,在这本《徽商研究》中,我们几乎在每一章中都征引了一些新材料,而比较集中的是《徽商个案研究》这一章所引用的材料,

差不多全部都是新搜集的。关于徽商经营方式一节,是根据从几千份徽州契约文书中爬梳出来的材料加以整理研究撰写成的。胡开文分家阉书则是第一次公开面世,从阉书的资料价值来看,它远远超出了徽商研究这个范围。歙县芳坑江氏茶商的材料,也是从江氏几代茶商遗留下来的数百本帐簿和数千封商业往来信件中第一次整理出来的。

在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在这本书中,有小部分内容曾经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但在这次书稿编撰中,又作了必要的修改,有的则作了较大的增删。因为这是一部专题研究性的书稿,把我们自己以往的研究成果,选择一些放在里面也是合适的。

我们深知徽商研究的起点甚高,难度甚大,而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限,又受到研究条件的限制,因而这部《徽商研究》自然难以尽如人意,其中错误与不当之处一定很多。我们恳切地期待着一切关心徽商研究的学者不吝赐教。

这部书主要是由张海鹏、王廷元、王世华、周晓光、李琳琦几位同志共同撰写的。

我们在编撰这部书稿的过程中,特约请了鲍义来先生撰写了第九章《徽商与徽州文化》,周绍泉研究员撰写了第十章中《徽州文书所见明清徽商的经营方式》一节,江怡桐同志撰写了第十章中《歙县芳坑江氏茶商考略》一节,张健同志撰写了第三章中《徽商在武汉》一节。

全部书稿都经过主编的审阅与修饰。本书的责任编辑曹文益同志对此书的写作、定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敬致谢忱!

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中心

1995年7月25日

目 录

第一章 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	(1)
一、徽商的形成	(1)
二、徽商发展的几个阶段	(9)
第二章 徽商的资本积累	(17)
一、徽州商人的小本起家	(18)
二、商品贩运与徽商的商业利润	(26)
三、商品囤积与徽商的商业利润	(37)
四、垄断贸易与徽商的商业利润	(45)
五、徽商资本的组形式	(68)
第三章 徽商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	(83)
一、徽商在上海	(83)
二、徽商在苏州	(94)
三、徽商在芜湖	(108)
四、徽商在武汉	(120)
五、徽商与吴楚贸易	(132)
第四章 徽商与两淮盐业	(149)
一、徽商进入两淮的几个阶段	(150)
二、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的优势	(166)
三、从扬州到徽州的繁荣	(185)
四、两淮盐商的衰落和徽商门楣的光大	(205)

第五章 徽商在茶、木、粮、典和棉布业中的经营活动	(219)
一、徽商与茶叶贸易	(219)
二、徽商与木材贸易	(251)
三、徽商与粮食贸易	(268)
四、徽州典商述略	(289)
五、徽商与江南棉织业	(300)
第六章 徽商与封建势力	(314)
一、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	(314)
二、明代嘉靖年间徽商的抗倭斗争	(334)
三、清代徽州盐商经营的曲折道路	(352)
第七章 徽商的“儒贾观”和商业道德	(381)
一、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	(381)
二、“左儒右贾”辨	(406)
三、徽商的经营之道	(422)
第八章 徽商资本的出路	(441)
一、徽商利润的封建化及其社会条件	(441)
二、评“江南大贾不置田土”说	(456)
三、徽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其心理探析	(489)
第九章 徽商与徽州文化	(504)
一、徽商与徽州教育	(504)
二、徽商与新安画派	(510)
三、徽商与徽州建筑、徽派园林	(517)
四、徽商与新安医学	(525)
五、徽商与徽州刻书业	(534)
第十章 徽商个案研究	(544)
一、徽州文书所见明清徽商的经营方式	(544)
二、对几份徽商析箸阅书的研究	(561)
三、歙县芳坑江氏茶商考略	(585)

第十一章 徽商的衰落	(609)
一、咸、同兵燹与徽州商帮的衰落.....	(609)
二、徽州商帮衰落的几个阶段	(631)

第一章 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

近年来,徽商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这不仅因为徽商曾在我国明清社会经济领域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还因为它的兴起、发展与演变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息息相关,通过徽商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去窥探整个社会经济的全貌。然而,诸如徽商究竟始于何时?徽商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究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徽商又是怎样解体的?对于这些问题,至今学术界仍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因此还必须进一步加以研究。

一、徽商的形成

徽商形成于何时,学者们的说法不一,其中有持东晋说,有持唐宋说,也有持明中叶说。我们认为,徽人经商的历史固然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年代,但是徽商的历史则应该是从明中叶开始的。因为这里所说的徽商应该是指以乡族关系为纽带所结成的徽州商人群体,而不是泛指个别的零散的徽州籍商人。徽商应与晋商、陕商、闽商一样,是一个商帮的称号。如果把个别的零散的徽州籍商人视为徽商,那么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后,徽州地区必定也出现了商人,讨论徽商始于何时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徽商始于何时的

问题,实质上只能是徽州商帮何时形成的问题。徽州商帮的形成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有一大批手握巨资的徽州富商构成商帮的中坚力量;其二,是商业竞争日趋剧烈,徽州商人为了战胜竞争对手,有结成商帮的必要。而这两个条件只有到明朝中叶才能具备。

前资本主义时代,商业资本的积累离不开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商人集团首先就是在国际贸易中发展起来的。国际性的大市场为当时商业资本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因为在这种长途贩运贸易中,商人可以充分施展其“侵占和欺诈”的伎俩,利用不等价交换获取厚利。所以恩格斯说:“至少在当初,商人资本只能从本国商品的外国购买者,或外国商品的本国购买者手里取得利润。”^① 中国虽然不是海上贸易国家,商业资本主要是在国内贸易中发展起来的,但中国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大商人集团的形成同样离不开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在中国,虽然自古就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的现象,然而在自然经济牢固统治的时代,可供长途贩运的商品种类不多,数量不大,贩运贸易的规模受到极大的限制。在这种贸易的基础上虽然也曾出现过一些豪商巨贾,但毕竟人数不多,互相间的竞争也不够激烈。所以那时候,各地方的商人既无形成商帮的实力,也无形成商帮的必要。直到明朝中叶,这种局面才有所变化。

明朝中叶以来,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自金花银的征收到一条鞭法的推行,赋税折征货币的部分日益增加,以致占有赋税总额的绝大部分。这一变化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又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赋税折银的结果,迫使生产者更多地出售产品,换取货币。大批产品投入市场,就使商品在当地难以销售,不得不向远方寻求市

^①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的补充》,见《资本论》第3卷,1966年版第1060页。

场,从而大大地促进了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尤其是纳赋的农民往往为时限所迫,不得不将其产品低价出售以应急需,人为地造成了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现象。这种情况更为贩运商人压价收货车取暴利提供了有利机会。在这种形势下,长途贩运贸易遂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发展起来。当时作为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工农业产品越来越多地被卷进流通领域,成为长途贩运的主要商品。贩运贸易的规模日益扩大,贩运路线也日益延长。城市和市镇越来越成为大宗商品的集散地和长途贩运贸易的起落点。许多农村的集市也日渐改变了往日的闭塞状态而与遥远的市场发生联系。随着商品交换“打破地方的限制”,贵金属白银也已成为主要货币,行用于全国各地。

由于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徽商的商业资本也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膨胀起来。明嘉靖时,歙人吴柯认为“士而成功也十一,贾而成功也十九”,遂弃儒服贾,果然“十致千金”^①。经商致富的成功率虽未必如此之高,但当时商品流通的扩大为商人牟利生财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则是事实。徽商潘侃说:“良贾急趋利而善逐时,非转毂四方不可。”^②他的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徽商致富的奥秘。徽商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在长途贩运活动中发家的。所谓“徽歙以富雄江左,而豪商大贾往往挟厚货驰下里,播弄黔首,投机渔利,始可致富”^③,确是当时的实情。万历《歙志》中把“走贩”一符列为徽人经商的五大方式之首。他们如此重视贩运贸易,正是因为这种活动会给他们带来迷人的厚利。徽州邻近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东南地区,徽人又有丰富的从商经验,这就使他们得领风气之先,较早地在商业活动中大显身手。他们利用运河、长江及东南海运之便,把五府地区的丝

① 《丰南志》第5册。

② 《太函集》卷14。

③ 歙县《许氏世谱》卷6。

绸、棉布,扬州的食盐,景德镇的瓷器以及徽州当地出产的竹、木、茶、漆、纸、墨、砚等等运销全国各地,又把华北的棉花、大豆,江西、湖广的稻米,长江中上游的木材运销苏浙,在贩运贸易中大获厚利,这就使徽人中迅速地涌现出一大批手握巨资的富商大贾。如休宁的商山吴氏则“家多素封”^①,艳草的孙氏则“比屋素封”^②,凤湖汪氏则“连檐比屋,皆称素封”^③,歙县的辣塘黄氏则几乎全是“富等千户侯,名重素封”^④的大贾。其他家族经商致富者也不胜枚举,致使当时的徽州以“富甲天下”^⑤而著称于世。事实表明,在明朝中叶,徽州商帮正是以这一大批富商大贾为其中坚而发展起来的。而当徽商崛起之际,晋、陕、闽、粤等地的商人也都在长途贩运贸易中发展起来,在全国各地的市场上成为徽商强劲的对手。为适应激烈的竞争形势,他们各自都有结帮的必要。于是商帮便作为商人组合的一种形式应运而生了。王士性说:徽人“商贾在外,每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近江右出外亦多效之”^⑥。这表明徽商结帮确是出自竞争的需要。在那个时代,商人只能利用他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合起来,互相支持,才能在竞争中维护自己的利益。徽商如此,其他商人也莫不如此。连起步较晚的江西商人也起而效尤了。足见商帮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徽州商帮是同其他几个较早出现的商帮几乎同时形成的。在明中叶以前,徽人经商的事迹虽已屡见于记载,但由于那时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不足,使他们的活动受到极大的局限。那时徽人的商业活动,主要还限于把徽州的土特产品运载出山,换

① 《金太史集》卷7。

② 《太函集》卷52。

③ 《新安休宁名族志》卷1。

④ 歙县《辣塘黄氏宗谱》卷5。

⑤ 《肇域志·东南十一·徽州府》。

⑥ 《广志绎》卷3。

取邻近地区的粮食,以济徽人食用之不足。他们还没有在全国的大市场上活跃起来,其他地方的商人也尚未结帮而与徽人争利。在这种形势下,徽商显然是不会自行成帮而在商业界表演独角戏的。

那末,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是什么呢?

商帮是一种松散的商人组合形式,它的形成是一个自发的渐进的过程。尽管如此,一个商帮的形成毕竟还是有其标志可寻的。徽商形成的标志主要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

(一)徽人从商风习的形成。只有为数众多的徽人呼亲唤友四出经商,他们才可能在各地市场上形成帮伙。所以徽人经商风习的形成应该是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之一。徽人从商风习究竟始于何时,人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万历《歙志》称,正德以前,民间还是“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的局面;正德末嘉清初,从商之风始盛,“出贾既多,田土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老于徽州掌故的许承尧对这段记载曾提出异议。他说:“吾许族家谱载,吾祖于正统时已出居庸关运茶行贾,似出贾风习已久,志(指《歙志》)殆举其概略耳。”^①许氏之说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在正德以前,徽人外出经商的事迹确已大量见于记载了。据我们的考察,徽人出贾之风大约始于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之际。《溪南江氏族谱》载:江才早年立志经商,而苦于资金不足。其妻郑氏鼓励他说:“吾乡贾者十九,君宁以家薄废贾也!”江才生于成化十年,成年后奔赴华北,经商致富。如果郑氏劝夫的一席话是在江才20岁左右说的,那么早在弘治初年,歙县溪南一带出贾之风已经很盛了。歙县辣塘人黄豹“少遭家畜,见邑中富商大贾,饰冠剑,连车骑,交守相,扬扬然,诩诩然,卑下仆役其乡人。喟然叹曰:‘彼之夥夥者,独非人耶?’”^②。遂立志经商,终致富有。豹生于成化二十二年,他的

① 《歙事闲谭》第1册。

② 歙县《辣塘黄氏宗谱》卷5。

少年时代正当弘治之初,足见那时竦塘一带的豪商巨贾已经炫耀于乡里,而经营商业已经成为人们竞相趋赴的致富之门了。万历《歙志·序五》载:“长老称说,成弘以前,民间椎朴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穡事,敦愿让,崇节俭。而今则家弦户诵,夤缘进取,流寓五方,轻本重末,舞文珥笔,乘坚策肥,世变江河莫可底止。”就是说歙县先贤们是把当地风俗变化的关键时期放在成化、弘治之际的。而成书于弘治初年的《休宁县志》中也有“民鲜力田,而多货殖”的记载。看来,起码在休、歙两县的一些地方,民间出贾之风在成化、弘治之际确已形成了。

(二)徽人结伙经商的现象已很普遍。嘉靖时,徽州大贾程君经商于两广,“门下受计出子钱者恒数千人。君为相度土宜,趣物候,人人受计不爽也。数奇则宽之,以务究其材,饶羨则廉取之,而归其赢,以故人乐为程君用,而自程君为大贾,其族人无不沾濡者”^①。可见当时徽人行贾,往往结成规模庞大的群体,其人数动以千计。这种群体是以宗族乡里关系为纽带结合起来的。在群体中,首领对众商在财力上予以支持,在业务上予以指导;众商则听从首领的指挥,协同行动。明中叶以来,类似这样的情形见于记载的很多。正如金声所说:休、歙“两邑人以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小亦数十家、数家”^②。值得注意的是徽人的这种活动方式大约在成化、弘治之际就已经开始了。据记载,徽人许赠贾于正阳 20 余年,他“睦于亲旧,亲旧每困之起家,故正阳之市,因公而益盛”^③。可见许赠贾于正阳时,已有一大批徽州商人在其指挥之下了。许赠生于景泰五年,弘治十七年卒于正阳。他在正阳为徽商首领的时间正是成化、

①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 61。

② 《金太史集》卷 1。

③ 《许氏统宗世谱·处士孟洁公行状》。

弘治之际。汪道昆的祖父汪玄仪曾北游燕代，贩盐行贾，“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受贾，凡出入必公决策然后行”^①。他率领昆弟子姓北上行贾也是弘治年间的事。

(三)“徽”、“商”(或“徽”、“贾”)二字已经相联成词，成为表达一个特定概念的名词而被时人广泛应用。明中叶以来，“徽商”、“徽贾”等词已屡见于记载。从许多例句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使用“徽商”一词时，徽商单个人的特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共同特征；而徽商的共同特征又与其他商人不同，他们是一群特殊类型的商人。就是说“徽商”既是从许多单个人的徽州商人特性中抽象出来的普遍概念，又是从“商人”这个属概念中划分出来的种概念。尽管在当时“徽商”一词还没有被当作表达单独概念的专有名词使用，但由于徽商有其共同利害，共同特征，他们又往往结伙经商，共同行动，所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早已把徽商视为一个群体了。万历《嘉定县志》载：南翔镇“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他镇，比为无赖吞食，稍稍徙避，而镇遂衰落”。在这里，徽商的去留是采取统一行动的；南翔镇的无赖们则专门“蚕食”徽商，而不殃及其他商人，对于徽商则统统加以“蚕食”，而不区别对待；《嘉定县志》的作者则把南翔镇盛衰的原因归结为徽商的聚散。他们都是把徽商作为一个群体对待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徽商”一词的出现乃是徽州商人群体的形成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成化年间，徽商一词就已在松江一带流行了。《云间杂识》载：“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一老人踵门拜不已。官骇问故。对曰：‘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松江是徽商早年最活跃的地方，徽商一词首先在这里流行是合乎情理的。

(四)作为徽商骨干力量的徽州盐商已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地位。明初行开中法，那时徽人虽有赴边纳粮、办引行盐者，但毕竟

^① 《太函副墨》卷1。

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竞争不过山、陕商人。及至成化末弘治初,开中折色法逐渐推行,使盐商得免赴边纳粮之苦,从而为徽商经营盐业提供了便利条件。所以开中折色法推行之初,徽人便乘地利之便,大批涌向扬州,把持盐利。这时山陕商人虽也纷纷南下与徽人争利,但他们远离故土,力不从心,其势力也不得不屈居徽人之下。万历《歙志》称:“今之所谓大贾者,莫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朋比而无多。”徽人在两淮盐业中的这种优势地位大约就是在明代成化、弘治之际开始形成的。歙县的蒧塘黄氏等族这时已在两淮盐业中称雄了。如黄崇德业盐扬州,“博览多通,……及监司下询,则条陈利害,言论侃侃,监司辄可其议,下其法于淮之南北。夫淮海诸贾,多三晋关中人,好唾奇画策,见公言论,皆削稿敛衽从公,推公为纲”^①。黄崇敬侨寓扬州“货大饶裕”,“卒之日,贾者罢市,垒拥哭公”^②。他们二人都是在成化、弘治之际发迹的。足见那时候徽人不但在两淮盐商中声势煊赫,而且手眼通天,可以左右国家的盐业政策,其势力之大已使山陕商人难以抗衡了。明代的两淮盐利最大,徽商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后,便迅速扩充了财力。他们或在经营盐业的同时兼营其他商业,或支持其亲友同乡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这对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徽州商帮应是成化、弘治之际形成的,这时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都已显现出来了。

^① 歙县《蒧塘黄氏宗谱》卷5。

^② 歙县《蒧塘黄氏宗谱》卷5。